

冲击和反响

——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反思

本文的出发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个人之间的，还是集体之间的——只有建立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科学和艺术乃至一般文化，也只有建立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之上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不然的话，一个民族思想文化的发展就会是畸形的，并对内对外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本文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行程作为一个例证来说明这一点。

近代中国是多灾多难的。这是由于她饱受外来的侵略，同时又受到本国内部特权阶级利用特定的条件的昏庸统治。这些内外条件的交织，就为中国近代的历史规划出了一条特别曲折的过程，使她未能沿着一条比较平稳和平衡的道路顺利地发展下去。这不但对她自己是不利的，而且对全世界也是不利的。

如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曾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但是由此而产生了光荣和骄傲，在她没有遇到与她相匹敌的对手之前，却也给她养成了一种盲目自大的优越感，以为其他一切民族及其文化都是低劣的。十八世纪英国使臣第一次来觐见中国皇帝时，为了跪拜的礼仪问题而引起一场风波。应该说，那不单是中国皇帝的心态，而且也是许多中国士大夫的心态。不肯在平等的基础上对待别人，就必然要为此而付出惨痛的代价。自从文艺复兴以后，中国便开始丧失了她在世界中世纪史上的领先地位

位。但是思想上的惰性却使她仍然死抱着自高自大的心态不放。这就在她近代化的道路上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到了19世纪，西方的炮舰在鸦片战争中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天朝上国的优越性的神话破产了。这时候，清政府仍然认为自己的体制和思想文化是高于其他民族之上的，他们仅仅承认失败是由于外来者的船坚炮利所致，只要能学到西夷的技术，就仍然可以保持住自己优越于夷人的地位。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识也只停留在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这一点上。他们很少考虑到自己的体制、文化和意识形态应该怎样改造，赶上时代，相反却认为这些理所当然地是最优越的。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国不但一再被西方列强所击败，而且在中日战争中被曾看作等于一个藩属的蕞尔小国——日本所击败。这次失败唤起了中国思想界的一次大觉醒。他们开始认识到这并不单纯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必然要和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各种条件相联系、相制约。因此就涉及到许多更深刻得多、更复杂得多的问题。

问题不只是出在中国方面，而且也出在西方。早在19世纪末叶起，西方传教士就络绎来到中国。但是当时，他们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两项：一是中世纪的神学体系及其世界观，一是托勒密的世界构图。两者都是属于以往历史时代——中世纪的东西，并没有对中国的思想文化起到很大的影响。当时的西方已开始步入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也正是怎样才能从中世纪转入到近代。假如当时西方所介绍给中国不是中世纪的文化，而是由笛卡尔和培根所开创的近代思想和由哥白尼、伽里略所开创的近代科学，——这个假设在历史上并非是不可能的事——那么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面貌和历程或许会有很大的不同。不幸的是，当时西方列强带给中国的除了炮舰的威胁而外，很少有什么真正先进的东西。驱使他们到中国来的动机，首先是追求政治和经济的特权，而不是善意和友好的思想文化交流。这就是

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这一任务，何以终于只能是落在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身上的缘故。可是直到19世纪末，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才真正对西方文化有了正面的接触。他们之中，数严复和梁启超，为当时对西学最了解的中国人。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当时中国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做出了怎样的反响。严、梁一辈人已经深感到此前中国对西学的认识是停留在技术的层次上，即所谓只是“形下之粗迹”。他们开始意识到要把西学提高到理论和制度的高度上面来考虑。梁启超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霍布斯、卢梭、康德和边沁；严复翻译了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穆勒和赫胥黎的著作。然而，任何外来的文化都有一个要与本土的条件相适合的问题。本土文化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和要求在吸取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当时中国所面临着的当务之急是，怎样抗拒外侮、救亡图存，以免亡国灭种；因此，当时传入的西方思想之中，最能打动中国思想界的心弦的，不是别的，而是天演论。天演论给了中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世界观：原来人是从猴子变来的，一切神圣的典章制度原来都不是什么圣人的制作，而是历史长期演化的结果。中国文化必须迎上世界的潮流，与时俱进；倘若仍然株守着她古来的传统一成不变，就要被历史所淘汰。这种思想恰好符合了当时中国现实之所需。然而，赫胥黎所谈的进化论的论理涵义，到了中国却转化为发奋图强的理论根据。而亚当斯密的个人主义、孟德斯鸠的三权分主、穆勒的归纳法乃至康德的先验哲学，没有产生象天演论那种警钟式的巨响。当时中国民主革命派却在卢梭的民约论里面找到了他们的福音。卢梭主权在民的理论提供了推翻腐朽的清政府的最好的思想武器。进化论和民约论就这样成了在当时中国建立一个近代国家的理论基础。

1911年后，在名义上中国建立了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是这个共和国的领袖和精英们都没有能体会到这一点：即旧的传统是不

可能彻底砸烂的，新思想也是无法对旧思想进行专政的。他们总是设想着一夜之间就可以除旧布新。为此他们付出了正反两次代价：一次是在五四时期，一次是在“文革”时期。两者性质根本不同，但都简单地希望能和过去的传统作最彻底的决裂，都在企图割断历史这一点上跌了跤。五四运动打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无疑地，德先生和赛先生是近代文明的主潮。但问题在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其中一切的好的和坏的）应该怎样加以安排和处理。“五四”的一些人过分简单地要把它们全盘抛弃。事实则恰好相反，它们并没有被根绝而是顽固地盘据着和纠缠着中国的思想意识。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但是和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不同的是，继启蒙而后并没有出现一场人权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所谓“文革”又一次重演了同样的悲喜剧。文革是要以暴力的方式用一种思想来摧毁和取代其他的一切思想，它在表面上似乎有着某些外来的渊源，例如斯大林主义，但从根本上说则仍是本土的成份。即毛泽东晚年的理论。这是它之所以得以发动的原因。革命是不能输出的，这条原理也在文革中得到了验证。“文革”在思想上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实验；而它所带来的后果，也是史无前例的。思想终究是不能凭暴力手段来摧毁或建立的。

在近代史上，中国的思想文化经历了几度起伏：最初坚持古老传统的独尊遭到失败。接着从西方引进了进化论和民约论，继而呼唤科学和民主，想以此取代旧传统而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但是这些尝试又由于未能真正结合并改进自己固有的传统而失败了。毛泽东以其自己独特的思想发动了一次文化大革命，但其结果与他的愿望背道而驰。经过了闭关、开放、再闭关，今天的中国又再一次向外开放。于是西方思潮就再度涌入中国。尼采、韦伯、弗洛伊德、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目前都在中国流行。正如不同的食品对于一个健康身体的成

长是必要的，多样化的思想对于哺育和丰富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也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正如一种营养不必一定要排斥其他的营养，一种思想和文化最好也能宽容其他的思想和文化，而不是消灭它们。

中国几千年来专制主义，养成了思想上定于一尊的传统。这从而导致近代的中国屡次由于她在思想上的不容忍和僵硬化而妨碍了自己去吸收一切可能的营养并使自己获得茁壮的成长，甚至于把凡是不同于自己的意见，都看成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就造成了一种可悲的后果，它不但妨碍了思想文化的进步，而且也激发了人与人之间完全不必要而且是灾难性的矛盾和斗争。思想的生命力就在于合乎真理。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来说，科学和民主是相辅相成的。不民主的精神是不利于人们探索真理的，专政只能是一个政治上的概念，思想领域上的专制主义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实践上则贻患无穷。

如果说，中国为了她自己的不智而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那末在这方面，西方对中国所采取的态度也同样地应该加以指责。长期以来，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竞相在中国攫取特权，而在思想文化上却很少做出什么与之相称的贡献来。这只能说是一种自私的短视。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已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自己邻国的经济的繁荣而不是它们的衰退。世界各国经济的衰荣，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世界各民族思想和文化。可是西方列强（也还有日本），却出于他们短视和自私，长期以来从没有正视过这个问题，它们从没有做出过多少认真的努力来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直到本世纪20年代，才由罗素和杜威来华，他们的讲演使中国公众第一次正式接触到了现代的西方思想。过去西方列强把太多的力量化在了侵略性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方面，而把太少的力量放在建设性的文化交流上，这对于中国固然是一大不利，对西方来

说，同样也不利。这等于剥夺了西方可以吸收中国的智慧来促进自己繁荣的好处。

在西方的压迫之下，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也变得畸形发展。为了抵抗外侮，她往往是以一种抗拒的而不是一种同情的态度来对待外来文化。义和团的排外心态长期潜伏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心中。某些中国人却跳到另一个极端，他们主张全盘西化。两者貌似截然相反，其基本出发点却是相同的，即都持绝对化的态度，认为两种不同的思想中，一个的生存就必须以另一个的消灭为前提。思想上的猜疑和敌视——那本来是不必要的——是造成不安和动荡的根源，是造成灾难的因素。它会挫伤人们的精神，使人们付出不必要的惨痛的代价。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越战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当代瓦解人心的最显著的例子。使代价降低到最低程度，这是政治的智慧和思想的智慧的关键所在。18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的告诫：对于不宽容者，应该给以绞刑，——在今天还是值得人们重温的。

假如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之中，双方都能够有更多的谦虚和善意，更少一点敌意的猜疑；那后果本来会对双方都更加有益得多。放眼当代世界情况并非是完全令人沮丧的。我们毕竟可以看到某些希望的曙光。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终究是比上一个世代或者上一个世纪有了很大的进步。人类的大多数已开始自觉地认识到人们应该以合作来代替敌对。中国的变化尤为显著的是：开放代替了闭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代替了以往对暴力专政万能的迷信。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西方也同样如此，半个世纪之前，欧洲的各个文明国家，相互之间还进行着无休止的生死搏斗，并对海外的其他民族大肆侵略、掠夺和压迫。但是过去的几十年间，出现了新的前景：你死我活的斗争状态，已被共同合作的关系所代替。已经建立起一个合作得很不错的共同体，敌对关系已经几乎完全让位给了友好合作和共存。那意义之重大将

远甚于17世纪各个不同教派之间以宽容取代对立。

当然，一个美好的和平与繁荣的世界，并不能一蹴而就。目前也还不会就出现一个全世界统一的共同体。但是难道不能设想若干历史文化背景相似、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民族，就不能也形成象西欧那样的共同体吗？例如，某些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共同体，或者某些拉美国家的拉美共同体。两个世纪之前，哲学家康德提出了他的永久和平论，宣扬人类的和平终究需要有一个世界政府。20年以前，哲学家罗素也曾反复强调过同样的意见。一个基于自由联合的人类共同体，当时对于许多人似乎只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但是今天看来只要人们有此智慧，也许并不是不可能的。就中国来说，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挫折之后，她正在变得更为宽容，无论对她自己人民的思想，还是对外来的思想。在开放和宽容的立足点上，我们可以期待她会变得更加博大，更能容纳多样性。那将是一个更壮大、更健康、也更是属于她自己的、同时对世界也更有贡献的新文化。当然这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

回顾人类过去的历史有着太多的敌对和对抗、专制和屈服。现在应当看到专制主义逐渐过时而正在成为历史的陈迹。把任何一种思想强加于人的情况，正在迅速地消失。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个人，无论其水平高低或贡献大小，都应该享有其独立的尊严和价值。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民族和人民都表现出真诚的善意与和解，这对于和平、对于文化的繁荣和进步，都不失为一道曙光。既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可以和平共处，不同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就更没有理由应该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早在一个世纪之前，法国的诗人哲学家顾友（Marie yean Gu yau, 1854—1888）就提出过，真理是多样性的。他说：我们不必害怕各种意见的不同，而是相反地应该鼓励它；人道的整体就是需要有千百万只眼睛和千百万只耳朵。近代中国的伟大启蒙者蔡元培也提出过兼容并蓄的文化理想。在他的这一思想引导之下，开始了中国近代伟大的

启蒙运动，即五四运动。如果人们能够容忍自由的思想 and 思想自由，做到尊敬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那么人类就有可能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文明之中；那时候，曾经给人带来过那么多的危害和灾难的优越感和自卑感、专制和屈辱就都将退位。那时候，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个人都将以其自己独立的地位和独特的贡献而成为人类文明的宝库中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目前人类充满着机会，也充满着危险。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做得好，就可以期待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任何愚蠢和错误（尤其是在当政者方面）也极有可能给人类带来无法弥补的浩劫。也许，人类的智慧以及足够多的历史教训，足以使人类能够迎接这场挑战，并且终于会做出是有益于人类而不是有害于人类的决定来。

• 何兆武 •

（附注：本文为作者1988年11月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第17届科学统一性国际会议上的发言稿）